

校太尉。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克睿卒，子继筠立，五年卒，其弟继捧立。七年（982年），李继捧因继立遭族人反对，故率族入朝，愿留京师，并献夏、绥、银、宥四州，授彰德军节度使。^①从此，党项李氏所据夏州、绥州、银州、宥州之地为宋直接管辖。

但是，当宋朝派遣官员到夏州时，在银州的继捧弟继迁，诈言乳母死，出葬郊外，遂与数十人逃于地斤泽（今靖边白城子北三百里）。李继迁，系唐末思恭弟思忠后裔，其曾祖、祖父皆坐镇银州，继迁即生于银州无定河。八年（983年），宋知夏州尹宪等曾夜袭斤泽，斩首五百级，焚四百余帐，获其母妻。继迁未屈服，他积极联络党项各部，以联姻的形式连娶它部豪族女，建立反宋联盟，以恢复“故土”为号召，得到了党项各部的响应和支持，声势日益壮大。

宋雍熙二年（985年）二月，继迁诱杀夏州都巡检曹光实于葭芦川，袭据银州，破会州（治今甘肃靖远）城，焚毁城郭而去。三年，李继迁采取联辽（契丹）抗宋的策略，向辽称臣，辽主册其为夏国王，并以义成公主妻之。这样，李继迁势力大增，成为宋朝的心腹大患，并多次击败宋军。在这种形势下，宋朝采取“以夷制夷”之策，起用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为赵保忠，继捧返夏州击李继迁。宋端拱元年（988年），继捧建议对继迁进行招抚，继迁拒绝接受。至淳化元年（990年）继迁攻夏州，继捧乞师，宋军至，继迁奉表归降，宋授其银州观察使，赐姓名为赵保吉。其实，继迁非真意降宋，只是对宋虚与委蛇而已。淳化四年（993年），宋朝采纳郑文宝建议，严禁青白盐入党项境，欲以经济封锁来制服继迁。然其结果适得其反，反而更加促进党项族的团结和反宋的情绪，沿边汉人也深受其害，故宋朝又下令弛禁。^②

此后，继迁对宋是时叛时服，并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宋至道二年（996年），继迁劫宋运至灵州刍粟四十万，并围灵武；宋遣五路大军进攻夏州，无功求和，宋朝被迫任命已实际上占有夏、绥、银、宥四州之地的继迁为定难军节度，夏州刺史，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于是已归北宋直接统治的夏、绥等四州之地，在名义上也重新成为党项李氏的统治地区。咸平四年（1001年），李继迁攻取清远军（治今甘肃环县北）。次年，又集各蕃部攻陷西北重镇、交通要冲的灵州，以为都城。六年（1003年），继迁又攻麟州，不克，转而西攻河西重镇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在回军途中，继迁为吐蕃潘罗支所袭，中流矢，伤重毙命。^③其子德明继立。继迁虽死，但夏州党项的势力日益强大，为其后建立西夏政权奠定了基础。

①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

② 参见宫崎市定：《西夏的兴起与青白盐问题》，载《东亚经济研究》第18卷2号。

③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

(下) 宋夏在陕北的争战及其影响

宋夏在陕北的争战

李继迁子德明继立后,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并希冀从宋朝那里获取大量的经济利益,故而在继立的第二年(1005年)遣牙将奉表归顺宋朝,请市青白盐,宋不许。宋景德三年(1006年),德明复奉表愿归属,宋廷即授其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西平王,并赐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给奉如内地。但责德明遣子弟入质,要求归还灵州,德明拒绝了这两项要求,于是宋朝对夏人进入内地贸易和撤销青白盐禁令也作了保留。此后,在德明掌权的二十多年间,与宋朝没有发生过大的军事冲突,并不时向宋进贡马、驼;从宋朝那里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使其境内经济有所发展,政权进一步巩固。其间,德明曾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东进至大里河(在今陕西绥德境),筑栅苍耳平。同时,德明还乘机向陇右、河西扩张,于宋天圣六七年(1028—1029年)命其子元昊攻灭河西回鹘,取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和瓜州(治今甘肃安西),将势力向西扩展到玉门关,控制了中西交通和贸易。^①

宋天圣九年(1031年)德明卒,其子元昊立。元昊则一反其父对宋的政策,外倚契丹,力图摆脱对宋朝的依附地位,独立称霸于北方。史称元昊“性雄毅,多大略……晓浮图学,通蕃汉字……”^②他立后,承袭宋授德明之封号,但却竭力推行提高党项民族意识的一系列措施。如否定唐、宋王朝对其赐姓李、赵,改姓嵬名氏,更名曩霄,自称:“兀卒”(“青天子”意);颁布秃发令,强迫国人三日内一律秃发,违者处死;创制西夏文字,改变与汉族传统有关的礼乐制度等。^③这些旨在加强本民族意识的措施,乃是唐末以来,北方民族如契丹、女真等族民族意识加强,希图尽力摆脱内地汉族政权影响的尝试。其目的是团结、凝聚本民族的力量以与内地汉族政权相抗衡。然而,元昊及辽、金的统治阶级却不得不借鉴内地汉族的封建统治制度和经验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而其统治地区内汉族也不少。因此,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他们本民族内部蕃化和汉化的斗争持续不断,最终汉化的趋势仍然占主导地位。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元昊还“明号令,以兵法勒诸部”;建都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新制官制,规定服饰,“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建蕃学、汉学;改年号显道(由宋年号“明道”避讳改)。^④在作好建立和巩固政权的准备之后,元昊即于景祐元年至三年(1034—1036年)进攻青海湟水流域的吐蕃唃廝罗部,

①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曾巩:《隆平集》卷二十《赵保吉传》。

②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

③ 《西夏书事》卷一十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一十五。

④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

并重取河西、肃、瓜、沙等州，扰环、庆二州等。宋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正式即帝位，定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遣使上表于宋。史家一般以此年为西夏建国之始。同时，元昊集党项诸豪右欲从德靖、塞门砦、赤城路三道进攻鄜延。次年，宋朝下诏削夺元昊官爵，禁边民与夏贸易。元昊即率兵攻围保安军（治今陕西志丹），又围承平寨（今陕西子长西南），为宋军击走。^①

至宋康定元年（1040年），元昊即开始向宋朝边境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从此揭开了宋夏战争的帷幕。战争从宋夏接界的山陕黄河起，西至陕北、宁夏、甘肃，直到河西，均时有战争。然而，战争最为激烈的地区是在今陕北横山一带。这里是宋夏的战略要冲，双方必争之地。对西夏来说，横山一线是其“祖先基业”，割据达数百年之久的地区；而且从战略上讲，控制此地可南下鄜延，东进麟府，取宋之关中和河东。若宋失横山一线，则关中、河东难守，宋京畿之地不保，若有此地则可控制西夏南下。正如宋名将种谔所说：“横山亘袤，千里沃壤，人物劲悍，善战多马，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其城垒皆据险隘，足以守御。”若据有银、宥、夏三州，则“横山强兵战马，山泽之利，尽归中国。其势居高，俯视兴、灵，可以直覆巢穴。”^②因此，宋夏在陕北的争夺战，在西夏正式建立至北宋灭亡八九十年间，成为宋夏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此发生的争夺战主要有三次。下面以这三次战争为主，加以概述。

康定元年初，元昊诈言请和，麻痹宋知延州的范雍，使之不设防，后集中兵力，突然向鄜延中路进攻，破金明砦（今陕西延安西北），守将李士彬父子被擒，乘胜围延州城。庆州、保安军等地宋军五将会兵万余于三川口（今安塞延安西川河汇入延河处）遇伏，全部被歼。夏军围延安七日，因大雪，退走。延安金明以北的塞门、承平、永平、长宁等砦为夏夺取。三川口之战的失败，给宋廷以极大的震动，宋朝急调陕西经略副使，主持鄜延路的范仲淹知延州。仲淹洞悉夏宋形势，主张持久的防御策略，并修筑寨堡，改革军队编制，大兴营田、听民互市、安辑羌汉流民等一系列措施。他还大力推广时任环州判官的种世衡的经验，修筑塞门、承平、永平等砦，招募弓箭手守御。正如史籍载：仲淹“稍招还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砦，于是羌汉之民，相踵归业。”^③经过范仲淹及其下周美、种世衡等的努力，鄜延路的防御有所加强，数次击退了西夏军队的进攻。

然而，就在此时（宋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夏军又大败宋军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北），死亡将校万余人。同年八月，夏军又转而向东，大举进攻河东路麟、府二州，遭到宋军的顽强抵抗。时知府州的党项折惟忠子继闵，早已坚壁清野，与夏军血战七日。^④夏军转而向北攻陷丰州，破定远砦，绝麟、府饷道，麟、府二州闭壁不出。朝议弃河外，守合河（今山西合河），帝不许，令张亢经营麟、府。张亢单骑入府州，开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三宝元二年条。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二十八宋元丰五年七月条。

③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

④ 见《折继闵神道碑》，载戴应新：《折氏家族史略》，1989年三秦出版社。

门纵民采薪刍汲，并于城外筑金城堡、安定堡，置兵守之。后夜袭夏军琉璃堡，大破之，夏军退去；又击败夏军于兔毛川，筑清塞、百胜、中候、建宁、镇川五堡，“麟、府之路始通^①”。此后，宋朝将陕西分为鄜延、环庆、泾原、秦凤四路，分别以庞籍、范仲淹、王沿、韩琦主之，以加强对西夏的军事。

至此，宋夏在陕北的第一次战争基本结束。然而，庆历二年（1042年）秋，西夏军队在定川砦（今宁夏固原西北）又大败宋军，九千余人全部覆没。经过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砦三次惨败之后，宋朝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西夏的防御，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其国内财政困难，物价飞涨，兵变、民变时有发生，因而对西夏采取了妥协的政策。而西夏方面，也因连年战争，蕃汉人民反对，国内疲困，国内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②，故也想和谈，从宋朝那里得到经济方面的好处。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达成和谈协议，夏国向宋称臣，宋封元昊为“夏国主”，岁赠夏绢、银、茶共二十五万五千，置榷场于保安军及高平砦，禁青盐等。^③从此，双方大约保持了二十多年的和平交往。

到宋治平四年（1067年），宋知清涧城的种谔（世衡子）诱降西夏驻守绥州将嵬名山，一举收复绥州，并改筑为绥德城。西夏主谅祚（元昊子）进行报复，诱杀宋保安军守将杨定等。后西夏提出以安远、塞门二砦交换绥州，但未能实现。由此，揭开了宋夏陕北第二次大争战的序幕。此次争战的特点，是宋朝经过二十多年对西北边防的整顿，力量有所加强，大致由以前纯粹被动的防御阶段，进入到相持和反攻的时期。

宋熙宁三年（1070年），韩绛巡抚陕西，用种谔谋取横山，筑罗兀城（今陕西米脂西北）、抚宁城及永乐等砦，向西夏横山一线进逼。西夏一向以横山为其生命线，故遣大军全力来攻，于是新筑诸堡皆陷，将士千余人皆没。^④此役，可视为双方在第二次大战前的最初接触。

到宋元丰四年（1081年），宋神宗重用宰相王安石进行变法，又取陇右置熙河路，从而构成对西夏的包围。适值西夏国内发生政变，西夏主秉常为其母梁氏所囚。于是，宋朝乘机集五路大军欲直捣兴庆，灭西夏。其中两路即出自陕北：一路由种谔率军出鄜延路，一路由王中正出河东路，两路计划先合于夏州，攻怀州，再与其余三路军会于兴庆。种谔率鄜延及畿内兵九万三千，出绥德城，攻陷米脂，进次银、石、夏州，驻军索家平，因军粮不济，天降大雪，军溃，返者才三万人。河东一路，王中正领兵六万，其中包括时知府州的折继闵子克行所率军。他们从麟州出发，渡无定河，先至夏州，无所获，折克行进拔宥州。尽管如此，此路宋军沿途士马多死，粮尽返回。^⑤其余三路宋军

① 《宋史》卷三百二十四《张亢传》。

② 《宋史》卷四百八十五《夏国传上》。

③ 《东都事略》卷一百二十七附录《西夏传》。

④ 《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同书卷三百三十五《种世衡附谔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十八宋元丰四年条。

⑤ 《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同书卷三百三十五《种世衡附谔传》；《续资治通鉴》卷三百一十八宋元丰四年条。

也因种种原因而被迫回军。此次宋朝五路出征,未获成果,损失惨重;而西夏也因坚壁清野,为宋军所攻,损失也不小,元气大伤。特别是陕北两路军曾一度攻占其视为生命线的横山一带夏、银、宥、石等州,横山北侧一些废城砦为宋军所得,并加以修葺或加强。如种谔以鄜延之师城细腰、吴堡、义合、塞门、米脂五砦,河东城葭芦、吴堡二砦。^①此次战役是宋朝首先发动的,从总的情况看,宋未达到预期的目的,损失惨重;但从陕北地区看,此役虽损失很大,但也以修筑城寨的形式向夏边界推进了一大步,控制了若干重要的军事交通据点。这正如苏轼所说:此战之后,夏人在“横山之地沿边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余里^②”。战后,种谔等人上言“城横山”,主张先城银州,次宥州乌延、夏州,“三郡鼎峙,则横山之地已囊括其中”^③。而后,徐禧与沈括议,奏准先城银州东南二十五里之永乐城。同年(1082年),永乐城筑就,赐名银川砦。西夏倾国之师来攻,号称三十万,骑兵号“铁鹞子”,于城外往来冲突,城破,阵亡蕃汉官二百三十人,兵万二千三百余人。^④

宋夏在陕北的第二次大争战,以宋五路进兵开始,至永乐城陷为止,从表面上看宋朝仍处于失败的地位,损失巨大。然而,从总的方面来讲,宋朝已于陕北修筑了许多城砦,已逐渐进据横山之半。这一形势正不断扩大。

永乐之战后,宋夏双方疲困,均有和谈的要求。夏请宋归还兰州及米脂、葭芦、浮图(今陕西绥德西)、安疆(今甘肃庆阳东北)五砦;宋仅答应归还米脂、葭芦等四砦,条件是放还永乐被俘人口。宋元祐四年(1089年),宋夏和议达成,但边界问题仍悬而未决,时有争战发生。如祐元六年(1091年),夏军攻围麟、府两三日;七年,又攻绥德。夏虽有小胜,但总的形势,仍然是宋以筑城砦的策略,步步向夏进逼。特别是在章惇任宋宰相后,他劝宋哲宗对夏采取强硬政策,停止划分地界,加紧修筑城砦,浅攻近逼。

宋绍圣三年(1096年),夏军大举攻宋,入鄜延,西自顺宁、招安砦,东自黑水、安定,中自塞门、龙安、金明以南。十月,夏军一支从麟州攻金明,破之,宋守军二千八百人仅五人逃出,又攻绥德,为宋军战退之。^⑤夏人对陕北的几次进攻,可以说是宋夏在陕北第三次大的争战,不过此时对夏国来说,已是强弩之末了。

四年(1097年),宋军连破夏洪州(治今陕西定边南)、盐州,一度攻入宥州。到宋崇宁四年(1105年),宋又取银州,改为银川城。时童贯以李宪领六路边事,又大量进修堡寨。至此,宋朝最后夺取了横山一线,占据了战略的主动权;而西夏,也因国内各种矛盾而日益衰弱。正如《东都事略》(卷一二八)撰者所说:“初,夏国恃横山诸族

① 《东都事略》卷一百二十八附录《西夏传》。

② 《宋文鉴》卷五十五,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

③ 《宋文鉴》卷三二八,苏轼:《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宋元丰五年七月条。

④ 《宋会要辑稿》兵八之二十八,《宋史》卷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等所记数字偏大,从前者。

⑤ 《宋史》四百八十六《夏国传下》等。

帐强劲善战，故用以抗中国，种谔谋取横山……童贯旧常从李宪，得其仿佛，故献议进筑，遂领六路边事，将诸路兵六七年，进筑军垒，建立堡砦，遂得横山之地。夏人失所恃，遂纳款。夏国自是少衰矣。”

宋夏陕北争战的影响

长达五十多年的宋夏之间断断续续的战争，给双方均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对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于此，前人论述颇多，不赘。现仅就宋夏在陕北的争战对陕西民族及民族关系的影响，略加论述。

首先，宋夏在陕北的长期争战，给陕西蕃（主要是党项羌各部）、汉人民均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夏军每次大举进攻，蕃汉双方士卒、百姓死于兵燹者动辄以千计，家园被毁，田园荒芜，流离失所，饥馑相望于道。其中受害最深者，为介于宋夏边界山险间的“属羌”（党项熟户）。宋夏建立后，元昊扩张，“于汉界缘边山险之地三百余处修筑堡寨，欲以收集老幼，并驱壮健为入寇之谋”。而宋范雍知延州时纵容部下对属羌肆意攻掠，杀老幼以为功，“毒贯人灵，上下文移皆谓之‘打掳’。”^①只是在范仲淹知延州后，宋朝上下才认识到对惯于战斗的属羌争取的重大意义，情况才有所改变。

由宋夏在陕北的长期争战，关中等地的汉族也深受其害，由于征战讨伐，飞鸟挽粟，赋役迭起，服役籍兵，关中人民苦不堪言。其一是屡次籍兵。史称当时“自陕以西，间阎之间，如人人有丧，户户被掠，号哭之声，弥天亘野”^②。被征者四处逃避，而官索其父母妻子，更加追捕，“鬻卖田园，以充购赏。”^③大规模的籍兵竟“使陕西之民，子子孙孙常有三分之一为兵”^④，造成了大批劳动力丧失，经济衰败的局面。其二是支付军粮及承担边地转运之役。元丰四年宋夏之战，关中民因支粮之苦，逃逸者甚众，“虽给雇直”也不愿受雇出塞。^⑤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上疏中出说：“关中饥馑，十室九空，为贼盗者纷纷已多。”^⑥仅此两端，就可看出，在宋夏战争中，关中等地汉族人民承担了多大的痛苦和牺牲，其结果是使关中遭到严重破坏，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然而，宋夏战争虽然给陕西各族人民带来的主要是痛苦和灾难；但是战争也从另一方面对陕北地区的开发建设和各民族的交往、融合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宋夏争战中的陕北，是双方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宋朝从多次战争失败中总结出了修筑堡寨、浅攻近逼的战略方针。从康定元年三川口战役之后，知延州的范仲淹吸取种世衡城清涧、张亢于鄜延修堡寨的经验，加以推广。此后，宋历任边州官吏对修筑堡寨均十分重视。到绍圣、元符时，宋朝以所修堡寨步步向西夏进逼。据有的研究者统

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二宋庆历元年条。

②③ 《司马文正集》卷五，《乞罢陕西义勇第二上殿札子》。

④ 《司马文正集》卷五，《乞罢刺陕西义勇第四札子》。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二十五宋元丰四年十二月条。

⑥ 《宋史》卷一百九十一《兵志五》。

计,宋夏战争期间宋在陕北地区修筑的堡、寨、镇和所置的军,共计129个,其中鄜延路有3军(绥德军、保安军、威德军)、1镇(丰林镇)、7城、31寨、24堡;河东路所属麟、府两州境内有1军(晋宁军)、1城、18寨、26堡;环庆路所属今陕北地区则有1军(定边军)、2城、4寨、10堡。^①这些堡寨地址的选择,大多是“道路通达,水草丰足,良田可耕,险固可令易”的地方,^②最后达到尽取横山之地,取得了战略上的有利地位。

不仅如此,这些城寨大多建于交通道路通达、有良田可耕之地,为今后陕北以城寨为中心城镇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对进一步开发陕北提供较好的条件。比如,这时期所兴筑的米脂寨、清涧城、吴堡寨、葭芦寨、神木寨、绥德城(军)、安塞、安定堡等,如今均为陕北的重要市县米脂、青涧、吴堡、佳县、神木、绥德、安塞、子长等。此外,今陕北还有30个乡镇所在地,溯其源均为宋代城寨。^③

北宋在陕北修筑城寨,守军多为土人、汉蕃士兵,他们大开屯田,互市兴利,以解决运饷困难。范仲淹知延州时,推广种世衡经验,也“大兴营田,且听民得互市,以通有无。”^④庞籍接仲淹知延州,仍“数募民耕种,收粟以贍军。”^⑤这一系列的措施,不仅解决了一部分运饷困难的问题,也有利于陕北经济的发展。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陕北汉蕃人民在共同抵御西夏进攻的过程中,相互交往,共同战斗;而更有宋朝统治者为了争取他们共同抗夏,推行“蕃汉为一”的政策;故大大有利于蕃汉之间的融合。在宋夏陕北交界地区,有众多党项蕃户,他们均为宋夏双方争夺对象之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宋朝进逼西夏所修堡砦,如无蕃汉人民的驻守,那是毫无效果的。宋朝君臣及沿边守将从多年与夏征战中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在康定元年三川口战役后,种世衡在城青涧的同时,竭力争取附近党项羌人,“间出行部族,慰劳酋长,或解与所服带……繇是属羌皆乐为用。”^⑥范仲淹知延州,“号令明白,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贼亦不敢辄犯其境”。“及其卒也,羌酋数百人,哭之如父,斋三日而去。”^⑦

此后,宋廷上下更加重视从蕃部中选练蕃兵,所谓“蕃兵”,即“具籍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西北边羌戎,种落不相统一,保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自治平四年(1067年)以后,蕃部族帐益多,而抚御团结之制益密。”内仅鄜延路,就有蕃兵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五名。^⑧宋宰相王安石更有以汉法制蕃兵之议:“今熙河蕃部既为我用,则当稍以汉法治之,使久而与汉兵如一。”后又说:“蕃部既得为汉,

① 参见吕卓民:《宋代陕北城寨考》,载《西北历史研究》,1990年三秦出版社。

② 《宋会要辑稿》兵二十八之四十四。

③ 参见吕卓民:《宋代陕北城寨考》,载《西北历史研究》,1990年三秦出版社。

④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

⑤ 《宋史》卷三百一十一《庞籍传》。

⑥ 《宋史》卷三百三十五《种世衡传》。

⑦ 《宋史》卷三百一十四《范仲淹传》。

⑧ 《宋史》卷一百九十一《兵志五》。

而其俗又贱土贵货，汉人得以货与蕃部易田，蕃人得货，两得所欲，而田畴垦，货殖通，蕃汉为一，其势易以调御。”^① 后宋朝还于陕北等地立团结蕃部法，并议以蕃将统蕃兵，蕃官位均在汉官之下等。

总之，宋朝在宋夏战争中，采取了争取属羌，加强蕃兵组织等一系列措施，尽管其目的是为了利用他们来抵御西夏的进攻，而且其中也带有民族歧视的因素，但是，正如王安石所说，汉蕃兵如一，蕃汉为一，用夏变夷，如此则将大大促进汉蕃的融合。到明代以后，陕北的蕃部已基本不见于史籍，说明他们已渐融入汉族之中。这就是今天陕北汉族与杂居的各种民族长期交往、融合的结果，故其相貌、习俗、性格均与关中汉族有一定的差别，其原因就在于兹。

^① 《宋史》卷一百九十一《兵志五》。

王安石与西夏

台湾大学 王民信

北宋治平四年(1067)正月初八日,英宗皇帝崩,长子赵顼即位,是为神宗。时,赵顼年方二十岁^①。

赵匡胤建宋,历经匡义(太宗)、恒(真宗)、祯(仁宗)、曙(英宗)四人。历时百年,虽有战乱于边境,然国内仍称“承平”。或因“承平既久”^②,或因“重文轻武”^③,国内弊蠹丛生。今人刘伯骥谈及斯时时政谓“政风逐渐衰颓,官冗而无行政效率,兵冗而无战斗力,国家财政困难,人民生活艰苦,田地荒废,赋役不均,商贾凋敝,百弊层出”^④。故神宗即位后,立即“诏求直言”^⑤,诏称:

朕以菲德,承至尊托于公卿兆民之上,惟治忽在朕躬,夙夜兢兢,上思有以奉天命,下念所以修政事之统,愧不敏明,未烛厥理。夫辟言路,通上下之志,欲治之主所同趣也。其布告内外群臣,若朕知见思虑之所未及,至于朝之阙政,国之要务,边防戎事之得失,郡县民情之利害,各令直言抗疏以闻,无有所隐,言若适用,亦以得人,观其器能,当从甄擢。惟尔文武,其各体朕兹令之非徒也。

半年后,又“诏求直言”^⑥,“令御史台每遇起居日,令百僚转对”,一二年间(治平四年熙宁元年),下“诏”凡三十余道,其主要者有:

诏以孟夏农劳之时,令监司戒饬州县省事,劝民力田,民有艰食者赈之。^⑦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二百零九“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庚戌朔…丁巳:帝(英宗)崩于福宁殿,神宗即位,时年二十”。《宋史》十四《神宗纪》“神宗……讳顼,英宗长子…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戊寅生……(治平)四年正月丁巳英庙崩,即皇帝位”。

② “承平既久”,似是当时的习惯用语,且指战事未波及到全国,至少亦未及京师。如《长编》卷一百“天圣元年(1023年)正月壬午”条。

③ 《宋史》卷一百六十一《职官志》称“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诸军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知军州事”,“朝臣”皆“文臣”,以之“知军州事”,则武臣权弱也。

④ 刘伯骥:《宋代政教史》(1971年台湾中华书局)上册第120页。

⑤ 《长编》卷二百零九“治平四年闰三月庚子”条。

⑥ 《宋史》卷十四《神宗纪》“治平四年十一月戊寅”条,下引“转对”事见《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十(以下简称《宋续通鉴》)。

⑦ 《宋史》卷十四《神宗纪》“治平四年闰三月乙巳”条。